

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潘紫萱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摘要: 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 地区性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欧亚地区的重要多边合作机制, 自成立以来, 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成员国间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旨在以安全共同体为框架, 探讨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动因及挑战, 并提供相关决策参考, 为如何看待上合组织发展趋势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拓展新的视角。本文将从动因、挑战和策略方面分析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上海合作组织。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 安全共同体; 动因; 挑战; 策略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41885

一、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政治格局复杂多变, 地区性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地区稳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上海合作组织自 2001 年成立以来, 通过深化成员国间的安全合作, 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如何进一步提升影响力和凝聚力, 成为其亟待解决的问题。安全共同体理论为此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强调通过制度化的合作与信任构建, 实现成员国间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因此, 本文将全面探讨上合组织在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发展动因、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旨在为相关决策者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同时也为上合组织及同质性组织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安全共同体

(一) 安全共同体的核心意涵

安全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最初源自 20 世纪 50 年代理查德·瓦根伦 (Richard W. Van Wagenen) 的构想, 经由卡尔·多伊奇 (Karl W. Deutsch) 等学者的理论化发展成型。冷战结束后, 建构主义学者如阿德勒 (Emanuel Adler) 与巴尼特 (Michael N. Barnett) 在多伊奇等人的基础上, 对安全共同体概念进行了再界定与分类。综合多位学者及理论流派的见解, 本文界定的安全共同体, 特指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跨国区域, 其中成员国共享一种“共同体意识”, 并拥有坚实的制度与实践基础, 以保障内外部对“和平变革”的稳固预期。

(二) 上合组织与安全共同体

尽管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正式构想提出较晚, 但学术界早有声音指出, 自成立以来, 上合组织在欧亚地区安全合作中的角色演变已显现出安全共同体的特征。结合安全共同体的特征与上合组织的实际情况, 本文认为上合组织属于安全共同体的范畴。在上合组织框架内, 成员国严格遵守不诉诸武力的原则, 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且组织内部不存在独立的竞争性军事力量。与此同时, 上合组织秉持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合作理念, 并不断丰富其内涵, 促进了成员国对组织的集体认同感。

三、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动因

(一) 地缘政治

该观点认为, 随着地区大国与霸权力量间的竞争日益尖锐,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俄两国的引领下加速了安全协作的步伐, 旨在扩大自身影响力并削弱域外大国在本区域内的存在。中俄两国在推动上合组织的创立与壮大过程

作者简介: 潘紫萱(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

通讯作者: 潘紫萱

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两国自然成为组织内的安全协作的主导力量。这一动向体现了中俄意图将上合组织构建为一个地区性的平衡架构,用以制衡美国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亚成员国则利用上合组织作为平台,在中俄两大力量间寻求策略性的平衡。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最新进展及强化趋势预示着它可能逐步演变为一个成熟的安全集团。²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被视为一个针对西方国家的安全联盟,其反对霸权主义的言论及联合反恐军事训练活动被解读为对西方的一种对抗姿态,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的动力来源于地区大国与域外大国间的力量博弈。

(二) 成本收益

该观点指出,成员国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倾向于推进安全合作以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确保其国家安全不受侵害。区域安全局势的恶化促使安全合作机制向更高层次发展,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机制也随之从传统安全范畴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延伸。成员国加入上合组织的重要动因在于其能够有效缓解区域安全威胁、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其中反恐合作带来的显著成效尤为吸引中亚国家。当前,上合组织提供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主要有军事互信机制、地区反恐机制、地区禁毒机制、信息安全合作机制、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机制六大方面。³简而言之,成员国在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内共享的利益,构成了推动上合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驱动力。

(三) 价值观念

该观点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合作领域的进展与其安全共同体的构建紧密相连,其中“新安全观”与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成了上合组织安全协作的核心价值观念。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上合组织内部逐渐萌生了安全共同体的意识。伴随着组织机制的持续演进,“新安全观”日益成为推动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关键理念基础,促使成员国在构建安全共同体方面的意愿显著增强。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⁴可以说,“新安全观”与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丰富了“上海精神”的内涵,还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筑提供了强大动力。

四、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挑战

在应对安全挑战与缓和地区冲突的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的初创成员国围绕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长期协作,将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外化,逐步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中亚地区作为上合组织的核心区域,也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与此同时,各成员国通过社会互动进程,将“上海精神”的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形成了较为松散的集体身份认同。然而,上合组织所采取的开放策略预示着其成员构成将不可避免地经历扩大,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引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日益趋于多元化,这些变化对初创成员国间既有的制度化信任构成了挑战。

(一) 成员国的边界争端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争端,尤其是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对构建安全共同体构成了重大挑战。这些争端不仅反映了成员国间复杂的历史纠葛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也考验着上合组织作为地区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和韧性。

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俄及中亚国家便面临着重新界定国家边界的艰巨任务。尽管通过签署一系列军事信任与裁军协定,以及创立“上海五国”机制,中俄与中亚三国间的边界划分取得了初步进展,但这种合作并未能彻底消除中亚国家间的边界争议。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界争端尤为棘手,两国因边界不清多次爆发冲突,这些冲突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也严重破坏了地区稳定与安全,成为上合组织内部难以忽视的裂痕。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加入进一步复杂化了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领土争端格局。中印边界争议,这一源自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正式解决。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后,中印在2017年、2020年先后发生了洞朗对峙事件和加勒万河谷冲突。⁵这些事件不仅加剧了双边关系的紧张,也对上合组织内部的和谐与合作构成了挑战。

印巴之间的边界争端则更加根深蒂固,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一直是两国冲突的焦点。自独立以来,印巴两国为争夺克什米尔主权已爆发多次战争和冲突。加入上合组织后,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非但没有缓解,

² 李进峰.上海合作组织 20 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238-240.

³ 陈小鼎,王翠梅.扩员后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3): 113-115.

⁴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6月10日,青岛)[N].人民日报,2018-06-11,(003).

⁵ 刘若锋.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成效、挑战与应对[J].战略决策研究,2024,15(2): 60.

反而因印度撤销印控克什米尔自治权的决定而进一步激化,导致双边关系陷入低谷,地区安全形势骤然紧张。这一争端不仅影响了两国的正常交往与合作,也对上合组织内部的团结与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二) 成员国的多元认知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欧亚地区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在促进成员国间的安全与稳定、经济合作及人文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差异,成为影响其深入发展与集体认同构建的关键因素。这种认知差异不仅源于成员国间的异质性,更与各自独特的利益诉求及地缘冲突紧密相关,对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与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集体认同强度,深受各成员对本组织认知差异的影响。当前,除中国外,其余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尚存较大的提升空间,这种认知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组织的认知积极与否、利益诉求大小以及有无具体行动。⁶具体而言,“认知”涉及利用上合组织解决成员国间冲突的看法,“利益诉求”关联加入上合组织所期望获得的益处,“行动”则是指基于认知并旨在实现利益诉求所采取的措施。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文化、历史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它们在看待上合组织的作用和定位时存在分歧。中国视上合组织为推动新型国际和地区秩序理念实践的重要载体,积极参与其各项活动,致力于推动其发展;而俄罗斯虽对上合组织持正面看法,但并未将其视为提升决策能力和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核心平台,更多地聚焦于安全领域的合作;中亚国家则主要关注应对非传统威胁、解决地区争端以及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等方面的利益。新加入的成员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则更加关注经济、安全和政治等方面的利益,期望通过上合组织平台实现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

这种认知差异不仅体现在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功能和作用的想法上,更在合作实践中产生了分歧和争议。不同成员国在加入上合组织时,都有其特定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的差异使得成员国在合作中难以达成共识,影响了上合组织的整体效能。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争端以及中亚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使得成员国之间难以形成统一的认知和行动,限制了上合组织在处理地区事务时的效能和影响力。此外,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差异还可能导致其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受阻。不同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和定位不同,可能导致其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时存在分歧和争议,从而限制了上合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种认知差异不仅影响了上合组织的内部合作,更对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五、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策略

(一) 完善调解机制

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框架下,成员国间的争端需遵循磋商与协商的和平解决路径。尽管各成员国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来调和领土、资源等领域的分歧,但此类争端往往根深蒂固,难以迅速化解。加之相应调解机制的缺失,现有的分歧与争端潜藏着升级为冲突的风险,这对上合组织成员国间信任关系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挑战。学术界已对上合组织争端调解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建议结合组织实际情况,构建包括设立“争端预防中心”在内的预防机制、以“反协商一致”原则为核心的管控机制以及灵活运用“协商一致”原则,建立协助解决争端小组的机制在内的“三位一体”争端调解机制。⁷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已确立了年度元首峰会、联合反恐军演等机制,有效缓解了创始成员国间的潜在紧张态势。然而,随着印度、巴基斯坦等新成员的加入,它们原有的争端也被纳入上合组织的讨论范畴,且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因此,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争端调解机制,已成为上合组织亟需正视的议题。

一方面,可组建一个多元化的分析小组,成员涵盖争端当事国及其他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专家学者。该小组将深入研究相关原始文件,并利用上合组织论坛这一“二轨”外交平台,围绕新老成员国间的争端等议题展开讨论。目前,上合组织论坛的议题多聚焦于数字经济、青年创新创业等低政治领域,但组织的长远发展实则高度依赖于政治、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稳定。因此,未来论坛可增设专家分析小组,专注于探讨领土、边界等关乎成员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为成员国间的争端调解提供策略建议,供元首理事会审议并形成具体实施方案。

另一方面,依托上合组织现有的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可设立冲突调解中心,定期召集包括第三方在内的边防部门负责人会议,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交流边境冲突解决经验,提出建设性意见。以印巴冲突为例,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存在长期争议,但双方均认识到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重要性。近年来,印巴两国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已多次举行和平对话和高层会晤,努力缓解边境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尽

⁶ 李孝天,陈小鼎.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特征、限制与改进路径[J].太平洋学报,2021,29(9): 35.

⁷ 王陈生,王树春.构建上合组织内部争端解决机制探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0(3): 54-55.

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双方的积极互动和外交努力表明,成员国间保持开放和建设的沟通态度对于解决复杂边界问题至关重要。

(二) 拓展共同利益

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合作基础根植于边境安全、联合反恐以及经济合作三大支柱,这些领域的协作不仅反映了组织成立的初衷,也是维系其长期发展与稳定的关键。上合组织的成立最初源于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对于边境安全问题的共同关切,边境争端的和平解决与稳定成为所有参与国的共同利益所在。随着边界安全挑战的逐步缓解,打击中亚地区肆虐的“三股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及宗教极端主义,逐渐成为了推动上合组织发展的新动力与成员国间的普遍共识。特别是“9·11”事件后,中亚安全局势因塔利班政权的覆灭而趋于稳定,尽管上述威胁依旧存在,但其紧迫性与致命性已大为减弱。加之美国在中亚的反恐军事部署,为地区国家提供了新的安全屏障,这一变化促使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格局发生了微妙调整。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拓宽共同利益基础、确保组织活力的挑战。

长远来看,经济合作或可成为推动上合组织持续发展的最强动力,也是构建未来成员国间最主要共同利益的基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提出的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倡议,以及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演讲,均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战略指引与新契机。这些倡议旨在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发展空间,为成员国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上合组织框架下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开辟了新路径。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已经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⁸然而,尽管经贸往来快速增长,成员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仍处于初级阶段,远未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主要归因于合作领域的局限性、成员国经济实力的差异、互信机制的不足以及在某些领域的竞争,这些因素制约了多边合作的深入发展。

为应对上述挑战,中国需采取更加积极的策略,不仅要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主持和推动具体的经济合作项目,还要利用自身在经济改革与市场空间方面的优势,帮助中亚成员国解决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这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援助以及分享发展经验,以促进中亚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同时,中国应适度采取“利益共享”策略,通过提升中亚国家的经济收益,促进其社会制度的完善,从而深化上合组织内部的合作基础与共同利益。目前,一系列重大能源合作项目已相继投入运营,标志着上合组织区域大能源合作网络已初具规模,为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打下了地基。通过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共同利益将进一步扩大,相互依存程度将不断加深,为最终构建安全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三) 深化集体认同

集体认同作为构建安全共同体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集体认同的形成,不仅关乎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与成员归属感,也是确立组织边界、获得外界认可的关键。尽管上合组织在构建集体认同的进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但通过持续努力,中国有望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集体认同的深化。

首先,理论基础的构建是深化集体认同的首要任务。尽管各成员国在民族、宗教、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上海精神”的提出与弘扬,为上合组织集体认同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精神体现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核心价值,已初步获得各成员国的广泛认同。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各种组织内外及国际场合,进一步宣扬“上海精神”,强化其作为集体认同理论基础的地位。通过深化对“上海精神”的理解与认同,各成员国将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构建安全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增进成员国间的沟通与互信是深化集体认同的关键环节。中国应致力于拓宽成员国间的联系渠道,完善多层次的会晤与协商机制。通过定期举办各类会议、论坛等活动,促进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各成员国充分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行为方式及文化背景,进而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互信的增强将促进成员国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强化上合组织的凝聚力与整体实力,为集体认同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增进互信的过程中,中国尤其需要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中亚地区的重要力量,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需要以各种积极的姿态向俄罗斯表明中国在中亚建立睦邻稳定带的努力,与俄罗斯视中亚为“特殊利益区”并无根本利益的冲突。⁹双方应共同努力,实现高度互信与多领域合作,为其他成员国树立榜样,增强它们对上合组织的信心与认同感。

⁸张根海.“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一个新的视角[J].学术论坛,2012,35(9): 55.

⁹张磊.迈向地区安全共同体的上海合作组织[J].军事政治学研究,2014,(1): 96.

此外,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是深化集体认同的重要途径。文化作为连接各成员国的纽带,具有独特的魅力与力量。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已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合作。中国应推动上合组织积极开展多边文化交流活动,形成政府倡导、民间积极参与的人文合作模式。通过加强在文化、教育、环保、科技、传媒、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推动文化交流的市场化进程,增进各成员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这将极大地促进集体认同的发展,为构建安全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六、结语

通过对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上合组织在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边界争端、多元认知差异等问题的存在,对上合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制约。为应对这些挑战,上合组织需要不断完善调解机制,拓展共同利益,深化集体认同,以增强成员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为构建地区安全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上合组织在安全共同体视阈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其在构建地区安全共同体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未来,上合组织应继续坚持“上海精神”,不断深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李进峰.上海合作组织 20 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2] 陈小鼎,王翠梅.扩员后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3): 108-134+159-160.
- [3]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 年 6 月 10 日,青岛)[N].人民日报,2018-06-11, (003).
- [4] 刘若锋.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成效、挑战与应对[J].战略决策研究,2024,15(2): 47-73+117.
- [5] 李孝天,陈小鼎.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特征、限制与改进路径[J].太平洋学报,2021,29(9): 30-42.
- [6] 王陈生,王树春.构建上合组织内部争端解决机制探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0(3): 48-56.
- [7] 张根海.“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一个新的视角[J].学术论坛,2012,35(9): 53-57.
- [8] 张磊.迈向地区安全共同体的上海合作组织[J].军事政治学研究,2014,(1): 88-101.

Study o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Community

Pan Zixuan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tinuously evolv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As a key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Eurasian regio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ha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afeguard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 among member stat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SCO in build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ecurity community theory, and to provide relevant policy references, thereby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CO's development trends and its ro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CO under the security community vision from the aspects of motivation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Keywords: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ecurity Community; Motivations; Challenges; Strategies